

# 论朱熹理学经典诠释法

——以《论语》“亲亲相隐”为例

魏子钦,黄 熹

(西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儒家哲学与文化自创始以来,其内部一直蕴含着经典诠释的发展理路。《论语》是儒家诠释之渊薮,汉、宋学者对此曾有过诸多讨论。其中,朱熹兼采汉宋,推陈出新,有别他者。以朱子诠释《论语》“亲亲相隐”为例,试寻看朱熹经典诠释之法。朱子通过“训诂考据”与“义理”并举、“生命与文化融合的体知”的诠释法,成功地纠正了“汉宋之弊”,实现排佛辟老、挺立儒学之目的,使得“天理”“人情”的理学命题内化于先秦经典中,回向至“性与天道”理学议题处,这也使生命的学问(成己)与学问的生命(成物)贯通浃洽,彰显儒家文化生命力。

**关键词:**经典诠释;朱熹;汉学;宋学;“亲亲相隐”

**中图分类号:** B24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21)04-0096-05

“理学家注释儒家经典,是用理学观点进行注释,用理学家的言论思想进行注释。”<sup>[1]11</sup>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就是这样做的。朱子通过诠释“四书”,试图建立儒家的人间秩序与价值信仰,一方面在彰显儒家“元典性”,另一方面也为儒学发展空间的延展提供可能。不过,这里面似乎存在着一定问题,就好像是同郭象《庄子注》般,是“庄子注解郭象”,还是“郭象注解庄子”,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朱熹面对汉宋之学是如何择选,又是如何诠释经典呢。鉴于此,以朱子《论语集注》中对“亲亲相隐”的诠释为例,拉长时间线,将其纳入儒家经典诠释史中,从汉宋诠释与朱熹诠释主张与设计角度,进一步体会朱子经典诠释思想,期望对朱子理学经典诠释法的理解有所推进。

## 一、“亲亲相隐”的诠释流衍

对于《论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解读,历来是学者们思索之关键,由其诠释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经典诠释法也不尽相同。如先圣孔子取认“六经”,欲通过“亲亲相隐”等言使“周文生命化”<sup>[2]53</sup>。至于如何诠释“六经”,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朱熹为之作注:“述,传旧而已……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sup>[3]193</sup>可以说,孔子“亲亲相隐”等言之“述”是深入三代的诠释法。

自孔子后理学家出现前的一批学者们,大体上对《论语》的诠释研究呈现出“训诂”与“考据”两类。要么是从“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sup>[4]2</sup>的训诂出发,对上古不同时期、地域的语言进行梳理。要么是“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何乎?是以论其世也”<sup>[5]193</sup>的对古代名物制度和历史事件的考据法。而且,关于考据法,宋明儒家多有所偏向。回顾“训诂”与“考据”下对《论语》“亲亲相隐”的文字疏解,汉时古文经学儒学力求“知人论世”对抗今文学家的“古为今用”,而魏晋南北朝之期的集解与义疏,可说是汉代古文经训诂法的又一发展与推进;宋明时期虽有理学的超克,引起文字训诂研究方法论,由汉唐重语义词源转向宋明理学视域下重义理发挥,然宋明学者亦不废小学之功,虽重考据,但指归义理;而清儒见长于考据,有重返汉唐之气,亦是对宋风后期流于空疏的拨乱反正。总之,这批儒者是站在汉学的角度,谈论文字原始意与风情掌故的历

收稿日期:2020-06-16

作者简介:魏子钦(1996-),男,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经典诠释;黄 熹(1973-),男,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与文化。E-mail: 442684716@qq.com

史还原与文化再现,似乎忘记了孔子欲使“周文生命化”的生命文化意识,忽略了其“斯文在兹”的历史文化情怀,缺少了一定义理思想的现世关怀。

“其实汉儒于义理亦有精胜之处,宋儒于训诂未必一无可取也。”<sup>[6]4</sup>章太炎也讲:“天人性命之理,经传备矣。经传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于事物而不托于空言也。”吕思勉评曰:“大抵一种学问,有其利必有其弊。”<sup>[7]78</sup>其实,重视“考据”“训诂”这批儒者,其实是共享一种相似理念:他们以“历史主义态度”诠释经典,试图建立一种诠释边界。期以训诂考据,达到对历史文化的明澈体察,落实到知人论世之追体验,但经典诠释活动始终都需要人的参与。一方面,典籍词句的基本解释,只能让读者对于经典的理解变得简单机械;另一方面,仅以此法辟仙派佛,儒家难取优势。面对此种诠释之弊,须回重义理的阐发突围原有束缚,适用于经学梳理的“训诂”“考据”必然转向新演进。当依循这样的观点,从义理角度出发,来审视“亲亲相隐”时,就会发现其中的闪光处,已经超越了训诂与考据本身。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理学大儒朱熹开启宋代经典诠释的新天地,其经典诠释法有别于以往儒者。

## 二、朱熹的诠释主张:“训诂考据”与“心性义理”的并举

章太炎讲:“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sup>[7]92</sup>陆九渊批朱熹不重“血脉”(《象山全集》卷35),但朱熹并不这样认为:

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然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至追至于脱略章句,陵藉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述,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为陋者<sup>[8]3640</sup>。

朱熹指出两个症结:一是秦汉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使儒家经典损坏、散佚,汉学学者仅以训诂章句求解,于圣心天道上少有言明;二是宋明儒者以“明性命之归”为鹄的,依向上之文化意识与向内之生命体验来重塑儒家精神,以克服汉学的疏解之失,但宋儒矫枉过正,使后学门人不知深求经典,亦不

讲训诂考据。

朱熹也指出汉晋治学之别,“自晋以来,解经者却改变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辈是也。汉儒解经,依经演绎;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sup>[9]1675</sup>。朱子大致肯定汉儒而批评晋人解经文学,其中含有对魏晋玄学解经之思想基础(老庄思想)的贬斥意味。

朱子在批评汉宋之弊的基础上,对汉宋之学多有吸取:“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sup>[9]191</sup>

一方面,朱熹肯认“汉学”,要求学者“一一认得”;另一方面,朱子也讲“向上透处”,在理解经典与感悟人生中,追求自我的觉醒、发展、完成,以言“性与天道”<sup>[1]</sup>。在以往研究中,学界对朱熹的义理研究已是充分,但对其训诂考据研究关注略有不足,以下将对朱子“训诂考据”的经典诠释研究着重论述。

朱子认为文字训释是解经之始事。解经应从“解字”始,“先释字义,次释文义”(《晦庵集》卷31)只有先行解字,才能发明“义理”。在对经典考据方面,朱熹通过稽考相关资料以通训诂。一方面,训释辞书。如《论语·乡党》中,“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诃诃如也。”“侃侃”“诃诃”,古注“和乐与中正貌”<sup>[3]117</sup>,朱熹采《说文》训:“侃侃,刚直也。诃诃,和悦而诤也。”<sup>[9]1001</sup>另一方面,考辩正文。朱熹注“过位,色勃如也”、《论语·乡党》言“位,谓门屏之间,人君宁立之处”<sup>[3]118</sup>。理由为:“古者朝会,君臣皆立,故《史记》谓‘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君立于门屏之间。”<sup>[9]999</sup>朱熹通过钩考《史记·商君列传》“古者朝会,君臣皆立”的典制,对“位”一字精确注释。

朱熹将训诂考据与义理并举,并在注解“四书”过程中,用力颇深。朱熹解“亲亲相隐”言:“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盗曰攘。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为,去声。……当是时,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sup>[3]146</sup>

朱子在此处虽涉及一定训诂,但更多偏向天理人情的义理讨论。如果将其放大至《论语集注》中,便会发现一些与本章相关的考据训诂工作,一方面,朱子关于叶公及叶的讨论。《论语·子路》言:“叶公问孔子于子路。”朱子注:“叶,舒涉反。叶公,楚叶县

尹沈诸梁,字子高,僭称公也。”<sup>[3]97</sup>另外,关于叶公的问题,朱子也有明确考据,因在上文已经论述,此处略论。另一方面,朱熹关于“亲亲相隐”之“直”的讨论,他把《论语》中的“直”多解读为“正直”,此处的“亲亲相隐”亦取这一含义。“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论语·阳货》朱熹把这种“直”与“仁”“知”“信”“勇”“刚”称为美德。“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学以明其理,则各有所蔽。”<sup>[3]98</sup>不过,也有例外。“古之愚也直”,朱熹说“直,谓径行自遂”,《论语·阳货》<sup>[9]</sup>此“直”为“直率”义。

朱熹站在高于汉宋之学的立场,对汉宋之学进行取舍。不过,若从义理角度辨识,则会发现朱子对“亲亲相隐”背后的思想解读已是剔透分明。在《论孟精义》中,朱子牵引诸家,并作阐明:

范曰:“父为子隐则慈,子为父隐则孝,父慈子孝,天下之直也。夫隐有似乎不直,至于父子天性,则以隐为直也。……隐与直反,然而父子必隐乃为直。”

谢曰:“顺理为直,父不为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邪?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较!”

杨曰:“父子相隐,人之情也,若其情,则直在其中矣。子证其父,岂人情也哉!逆而为之,曲孰甚焉。”又曰:“父子之真情,岂欲相暴其恶哉!行其真情,乃所谓直,反情以为直,则失其所以直矣。”

侯曰:“父子相隐,直也,岂有反天理而为直哉?故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尹曰:“顺理为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所以直在其中矣。”<sup>[10]459-460</sup>

对于这些言论,朱熹说:“杨氏之说本乎情,谢、侯氏、尹氏之说本乎理,皆有所不同也。今试以身处之,则所谓情者,可体而易见;所谓理者,近于泛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见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则人情之或邪或正,初无准则,若之何必顺此而皆可以为直也邪?”<sup>[11]817-818</sup>朱熹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角度讲“亲亲相隐”,强调“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既肯定父子相隐是合情合理,又认为此合情合理是形下形上的贯通。在朱熹看来,要想清楚地理解“亲亲相隐”问题,既要像杨时从人情出发;又

要像谢良佐、侯仲良、尹焞从天理而言,并将两者结合,使天人、礼法、情理贯通。

话至此处,可对前文所提的朱熹面对汉宋之学是如何择选,又是如何诠释经典呢?到底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问题给出明确回答: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不能机械地“非此即彼”地回答。一方面,朱子是在继承“四书”基础上而形成,且朱子对“四书”充满认同感。故此,他必不会以穿凿之机代替儒家先贤的圣心道理,这一点也可以从朱子的生平和学履历程看出来。另一方面,朱熹所处的时代难免不受佛老影响,加之朱熹个人气质与学脉继承关系,他所诠释的经典必会打上个人和时代“文化烙印”。所以,朱子所著之《四书集注》是“六经注我”,亦是“我注六经”。其中,就《论语集注》看,既是“朱子注孔子”,也是“孔子注朱子”。不过,朱子并未止步于汉宋之学,而是对经典诠释的工作进一步展开,即在经典诠释过程中融入了文化与生命融合的体知。朱子诠释经典以“训诂考据”“心性义理”“生命体知”三重诠释法来完成,实现了儒家经典诠释的“创造性转化”与“转化性创造”。

### 三、朱熹的诠释设计:生命与文化融合的体知进路

朱熹依“训诂考据”与“心性义理”并举法,拓展、深化了四书学,“甚至在一定范围之内转换了解释向度,建构了一个形而上的体系”<sup>[12]19</sup>。但朱子并未离开儒家根本,其目的是学以成人,成贤成圣,即追求天人合一的气象境界。蒙培元先生的讲法大致不错,如将其说法进一步展开,则可谓儒家所讲的根本,在于生命文化意识的体知。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达至圣人境界的天人合一,也是为了追求合外内之道,实现知识与价值的统一。

朱子《四书集注》与原本“四书”相比,在很多地方已发生变化,这在理论形态上有着更多显现。当然,朱子经典诠释的形成与佛老义理冲击有很大关系。但是,朱子《四书集注》中儒学基本问题和核心价值,并没有就此偏向佛老,它还是继续讲儒家圣言,即天人外内,成己成物,生命体知。从这一点看,朱子经典诠释做到“创造性转化”与“转化性创造”,这种思想在其《四书集注》中有着明确体现。

朱子所提出“生命与文化融合的体知之法”,并不是仅将“四书”作为一种知识对象,从认识论角度

进行诠释,而是将“四书”放大到了价值境域,放在自我处进行觉察反省,强调的是种亲历性和在场感,是知识的一个内在化的过程,是把认知活动和生命的直接体验融合为一体。如果以“对生命意识的体知”之法回看“亲亲相隐”,便可以发现此章又一深意: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sup>[3]179</sup>。

朱子在对《论语》“亲亲相隐”的注解中,并没有将圣贤的话当作客观的知识去对待,而是主张人们把外在的知识和个人的生活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进入生活世界切实体会生生不已的真生命之价值,即体会天理人情、亲亲之仁、儒家生命的真诚与实敬。孔子重在言仁,指出了仁是人的真实生命,是诸德之本、价值之源。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命是有根源的,无根则无生命。而人之根在于“孝弟”,是以“亲亲”养教以日成,人通过下学践仁行孝,便可上达契悟天道,体证无限价值。

仁是生生之理,但其表现在气化活动中,便有渐次过程,如四时流行,“渐”是生的秘密。在朱熹眼里,生命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而是“润物细无声”。譬如嫩芽初如针,假以时日,抽枝生叶,开花结实。而在人的生命中实现,必有程序,其实现有一发端处,孝弟便是仁的发端。人之生命力量含蕴“亲亲仁爱”的积蓄。孝弟亲情是这么自然,悄无声息。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在与凡动静语默间,世事流转,但惟致此事一念之孝弟,颠扑不破。在亲亲相隐的仁孝之间,万物生命是整体贯通的有机体。“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宇宙是天地、万物、人相关联、相依赖而形成的有机整体。生命不是独存的,而是互依相关的。朱子所流露出来的生命的体知思想,不仅共同构成了生命整体之流,也蕴育、支撑着“天理人情”的真生命。在这一过程中,生命、生生、生的意义通过“天理人情”而一语化出。

那么,如何理解朱子理解“天理人情”之真生命。朱子之学更多地聚焦于理解和安顿生命。这里所讲的生命,不是生物学的生命,也不是抽象上的生命,而是日常生活的生命。这种生命的文化与力量在“孝弟慈”中升达,在“天地之心”处生发,“亲亲仁人”,直见本心,调适上遂,直通天人。就生命本体而言,一个生命的历程就是生命文化

的体知历程。体知不是另有一个外在化的过程,更没有脱离生命本身的独立形式,而是和生命本体的存有状态融洽如一,生命文化的融合就是体知。生命遵循本体原则,生生不已,发用流行,生命价值的实现在于进入超越物我,主体生命与本体世界浑然一体的生命境界。这不仅是朱熹对生命与文化融合意识的体知体验,也是朱子诠释“四书”的最高目的,归至“性与天道”的真实用意。一如朱子训门人曰:

世间只是这个道理,譬如昼日当空,一念之间台着这道理,则皎款明白,更无纤毫窒碍,故曰“天命之谓性”。不只是这处有,处处皆有。只是寻时先从自家身上寻起……千人万人,一切万物,无不是这道理<sup>[9]2787-2788</sup>。

体知是人生的万般阅历,特别是一种道德实践的工夫,朱子明确了生命体验需内外结合的道理,使得知与行工夫的重要意义不断上升,在经典诠释中不断强化个人的生命意识。最后,生命的体知也是一个证实过程,将已有知识放到实际生活中去检验,化“亲亲相隐”理论为“亲亲相隐”德行。经过不断体证后,将书本知识化为自己生命,这样也就接近或者达到了圣人所描绘的境地。

人的生命存在及人的生命意识始终是朱熹经典诠释思想的焦点。人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历史和文化的存在。人的自然的现实生命意识、亲亲的生活生命意识和人文的文化生命意识,三者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文化形态。朱子之学是生命智慧之学,也是亲身践行之学,它关涉人的生命存在、价值与意义,具有强烈的“成己成物”的践行性、生命性与体验性。朱子之学注重个体生命体验与现实生活的开拓,是以生命与实践来贯通天人。不过,在朱熹的时代,他的这种诠释方法并非所有人都接受。“朱谓陆为空疏,陆谓朱为支离,二家异同,其要点在此”<sup>[10]460</sup>,朱陆主张不同,彼此辩论,互不相服。章太炎称:“古人之学也,即以是义贵其人,又何争于文字语言之末也哉!”<sup>[7]92</sup>按梁启超先生言,则是“平心而论,两派各走各路,各有好处,都不失为治学的一种好方法”<sup>[13]58-59</sup>。

## 四、结 语

朱熹经典诠释法立足于汉宋之学基础上,而行训诂考据与义理之法并举。这种方法打破汉宋学

者之藩篱,汉宋学者未有涉及,实超二学,开出新路。朱熹讲“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又讲“父子相隐,本非直,而‘直在其中’”,既肯定“父子相隐”是儒家讲究天理人情的合理选择,又认为“父子相隐”本非直,需要在对父母的达变劝谏中展现出正直。所以,仅以“训诂”“考据”静态地解读“亲亲相隐”,只是研究的出发点,若是纠缠于此,便会损伤经典文化血脉。只有发掘圣人微言大义,建立起历史、文化、生命(训诂考据、心性义理、生命体知)的血脉桥梁,才有可能真正理解经典深刻含义,继往开来,老树发新枝。

朱熹经典诠释法将生命的学问(成己)与学问的生命(成物)相连。朱子哲学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生命体知的智慧思想,提醒人们须明白求学不能满足知识积累,还要体察涵泳,调适上遂,以实现成己成物,追求参赞天地之境界。熊十力先生曾言:“朱子是注重修养的,也是注重知识的,他的主张,恰适用于今日。”<sup>[14]10</sup>在21世纪的今天,为何读书、如何治学?人们身处于这个世界又要如何安顿身心?这些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难题。面对这些问题,回看朱熹理学经典诠释法,可从中寻找到一定朱子思想的心声解答。

## 参考文献

- [1] 侯外庐. 宋明理学史: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2] 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
- [3]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 毛诗正义:上[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5]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6] 俞樾. 春在堂杂文续编·卷二[M]. 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
- [7] 章学诚. 文史通义[M]. 吕思勉,评. 李永圻,张耕华,导读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8]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9]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896.
- [10] 朱熹. 朱子全书·论孟精义:第7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1] 朱熹. 朱子全书·四书或问:第6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2] 蒙培元. 朱熹哲学十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3] 梁启超. 儒家哲学[M]. 长沙:岳麓书社,2010.
- [14] 熊十力. 境由心生[M]. 北京:红旗出版社,2015.

## On the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of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A case study of “tolerating and concealing between kinfolds”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EI Zi-qin, HUANG Xi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have been containing ways to develop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a reservoir of Confucian interpretation that scholars in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debated a lot. Different from other scholars, Zhu Xi not only draws lessons from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and also develops the new through critical assimilation of the old. The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Zhu Xi's method of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by studying his explanation of “tolerating and concealing between kinfolds”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y emphasizing both textual research and argumentation simultaneously and experiencing cultural blending in life, Zhu Xi succeeds in correcting errors i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Achieving the aim to refute the teachings of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affirming the basic viewpoints of Confucianism, Zhu Xi internalizes the Neo-Confucianism proposition of “heavenly principles” and “human feelings” into the pre-Qin classics by returning them into the Neo-Confucianist topic “human nature and heavenly way”. The thorough integ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knowledge of life (achieving oneself) and the life of learning (achieving external things) would manifest the vitality of Confucian culture.

**Key words:**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Zhu Xi; Han Studies; Song Studies; tolerating and concealing between kinfolds

【编辑 王思齐】